

我国城市弱势群体自助组织的 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发展*

——北京市病残青年俱乐部的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熊跃根 何欣

摘要：在全球社会福利改革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强调市民社会的互助与自我依赖是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而建立与发展自助组织是其中广为推崇的策略。本文以北京市病残青年俱乐部为例，对我国转型社会中弱势群体自助组织的社会资本的建构进行了分析和理论解释。经过调查，研究者发现，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社会变迁中，残疾人自助组织综合运用了自身的网络关系和市场策略，拓展了自身的社会资本。同时，文章也对弱势群体自助组织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并探讨了自助组织对残疾人社会生活与参与的积极功能。

关键词：自助组织 残疾人 社会资本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单位制的弱化和
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不断增加的社会需要与传统的社会福利服务供给体制
之间矛盾加大，为解决体制缺陷和社会服务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提出并
大力推行“社会福利社会化”这一重要举措，它标志着中国的福利体制由

* 本项研究是王思斌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与社会工作模式研究（项目号 02ASH003）的成果之一。笔者向接受访问的残疾人自助组织的成员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完成此项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的。



原来的国家中心主义向福利多元主义转换。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城市中以互助和社会团结为基础的各种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福利领域不断涌现,而残疾人的自助组织就是其中之一。自助组织是促进公民交往和相互支持的重要形式,它对增进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福利都有积极作用,而这些又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残疾人自助组织与社会资本建构的内在关系就构成了本文核心的理论与实践关怀。

西方近年来对自助组织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对象从白人、女性、中年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Gottlieb, 1982; Liberman & Snowden, 1993; Medvene & Krauss, 1989; Norton et al., 1993; Videka-Skerman, 1982),后来发展到女性癌症患者(Silverman, 1989~1990)等,但是针对残疾人自助组织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见。目前,在我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相关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探讨北京市病残青年俱乐部这一残疾人自助组织^①的发展状况及问题,通过深入访谈获得的定性资料来分析自助组织社会资本的建构策略,作者也期望这一探索性的研究能引起有兴趣的研究者针对此一领域展开讨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这一残疾人自助组织的个案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阐释组织成员和组织自身的社会资本建构。本文将着重讨论下面几个问题:第一,我国城市残疾人自助组织及其成员的社会资本状况;第二,该自助组织如何建构社会资本?成员的社会资本和组织的社会资本在该自助组织的发展中发挥怎样的功能?第三,残疾人自助组织在促进社会福利发展方面的作用和局限性是什么?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如何介入残疾人自助组织的实践?

二 文献探讨:有关自助组织与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

自助组织、互助组织以及其他互惠支持团体是现代市民社会中公民通

^① 作为本文研究个案的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是成立于改革开放早期、由残疾人自发筹建起来的自立、互助性的民间组织,它建立于1982年7月1日,是全国第一个此类组织。在2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在涉及残疾人基本权益的诸多领域如就业、婚姻、康复、培训、文化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赢得了广大残疾人的信赖和关心关注残疾人状况的人士的瞩目。目前,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在全国27个省市地区有会员600余名,俱乐部会员之间、非会员朋友之间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相互了解与帮助,提高了自我认知以及改善生活的能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的建立与发展是我国残疾人自助组织发展的一个有益尝试,它为发展我国残疾人福利和保障残疾人权益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和可供深入挖掘的议题,这也是研究者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出发点。



过集体努力解决共同的人类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和福利国家的改革,自助组织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公民的社会团结与社区参与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 自助组织及其相关研究

自助组织 (self-help group or self-help organization) 是由一群共同分享问题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员所组成的、通过互助来解决共同问题的组织。研究者选取了自助组织这种完全由公民自发建立和推动的基层非营利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期望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深入理解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新生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积极功能。

西方自助运动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其主要特征是以基于疾病、义务或人际关系问题等建立起来的小群体,以分享信息、相互沟通和解决问题为目标。而学术界针对自助组织的系统研究也基本上始于上述时期,当时学者主要关心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自助组织产生的原因、促进因素、历史背景及自助组织的特征等。里波尔曼 (Morton Lieberman) 和博曼 (Leonard Borman) 对自助组织做了最早的初步研究 (Lieberman & Borman, 1979)。那时学者们普遍认为自助组织的出现是应对工业化所产生的问题的一种策略,而自助组织的参与者也多是那些受到主流社会剥夺、被其疏离的弱势群体。到了 80 年代,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专业人员和自助组织的关系,开始侧重对自助的过程进行描述和分类,以及评估自助组织对其成员的影响 (Kurtz, 1990)。过去的一些调查发现,专业人士对自助组织的运作和如何协调自助组织与专业人员的关系缺乏了解。

近 10 年来针对自助组织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对自助过程和结果的讨论,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学者们认识到自助组织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治疗 (Borkman & Schubert, 1995; Kennedy & Humphreys, 1995; Kurtz, 1992; Rappaport, 1993),学者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对包括组织变量 (Kurtz, 1992; Maton, 1993; Moos, Finney & Maude-Griffin, 1993)、世界观和理念 (Kennedy & Humphreys, 1995; Medvene et al., 1995)、少数民族的参与以及国际和多文化现象的调查。这些研究更趋向于强调与参与自助组织密切相关的因素,同时认识到新成员的作用和重要性 (Luke, Roberts & Rappaport, 1993; Kurtz et al., 1995)。从学者对自助组织研究主题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自助组织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自助组织的态度和视角也产生了微妙变化。在范围上,研究者由最初的把自助组织看做是社会弱势群体缓解其基本生存压力的工具和途径 (Katz & Bender,



1976), 到认为自助组织参加者的典型特征是: 白人, 女性, 中年人, 受过良好教育和中产阶级 (Gottlieb, 1982; Liberman & Snowden, 1993; Medvene & Krauss, 1989; Norton et al., 1993; Videka-Skerman, 1982), 他们参加自助组织的动机则是获取自助组织提供的独特的社会资源和好处。在功能上, 也经历了从强调自助组织对社会问题的消极补救功能, 转变为强调自助组织作为潜在共同体在建构个人的社会身份、创造良好社会关系、增强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改善功能。

本文是一项对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这一残疾人自助组织的个案研究, 研究者期望透过残疾人自助组织的特征与发展状况, 来探讨自助组织成员的社会资本和组织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变化, 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阐释弱势群体的自助组织与社会资本建构的内在关系, 并进一步说明自助组织对残疾人的身心健康和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整合的重要意义。

(二) 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近年来社会资本一直成为社会学及相关学科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但是过去针对此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探讨, 以及对有规模组织与社会运动同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 (Fukuyama, 2001; Bourdieu, 1998; Coleman, 1990; Putnam, 1995, 2000), 多数学者忽视了对小规模、基于社区内部建立的自助组织的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的研究, 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Banks, 1997)。而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兴趣也明显增加了, 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比较注重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和研究社会资本, 关注的是个人如何建构并运用社会网络及相关资源, 而对组织中的个人特别是自助组织中的成员如何建构社会资本的研究还未给予重视, 而这一点正是本论文的研究焦点。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经济学家洛瑞首先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他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概念——社会资本。然而, 迄今为止, 人们对社会资本的精确的、具体的概念表述与测量尚未达成一致。尽管如此, 今天学者们一般认为, 对社会资本理论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的三位学者是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同时, 针对社会资本的相关深入研究是建立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其直接理论来源是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 (Granovetter)、林南等关于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研究。到 20 世纪末, 社会资本研究成了社会科学的热门概念工具和理论。人们普遍认为, 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行动的、可利用的资源。但是对社会资本的外延, 学者们则颇有争议, 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资本就是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带来



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另一种则认为社会结构的含义不仅包括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还包括一些广义的社会结构，如信任和规范。社会资本是嵌入在这些结构中的一个广义概念，包含了社会脉络中的众多方面，如社会联系、信任关系和价值体系等。

布迪厄、科尔曼和林南等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建构做出了贡献。在本文中，研究者将着重考察科尔曼的概念以及对分析自助组织的可用性。对科尔曼来说，社会资本被视作有利于行动者特定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资源。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组织、信任、义务、信息网络、规范、权威关系等都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大致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即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以及它们能为结构内部的人提供便利（Coleman, 1990）。

在科尔曼看来，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①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它保证了相互信任的维持；②稳定。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稳定不仅是社会组织意义上的，还是人员意义上的，“个人流动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③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④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也越多。社会关系的维护是维持社会资本和创造更多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Coleman, 1990）。林南作为社会网络学派的代表，提出了社会资源说。他认为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有目的的行动而获取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当社会关系被用于实现行动者的预期收益时，社会关系成为了社会资本。在这里社会资本不仅仅局限于信息沟通，由于拥有不同水平资源的人们也会由于各种社会关系发生联系，从而资源在他们之间发生了流动或者是交换，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也是实现资源流动和资源获取的有效渠道（Lin, 2001）。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的积累（或积聚）是通过能力的提升来体现的，这种能力具体是指改善组织成员的个人经济状况、增强身心健康、拓展社会网络等方面，包括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由联系引发的资源动员效果和由此产生的认同与相互义务（Van Deth, 2003）。

随着社会资本分析领域的拓展，它也被更多的运用到宏观的分析层面。普特南在其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作起来》一书中，试图用社会资本的理论解释为何意大利自70年代以来的地区政治制度改革在某些地区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地区却收效甚微。他指出：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



能促进成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减少群体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表现为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可能是保持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一个基本前提”(Putnam et al., 1993)。而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独自打保龄球》当中,普特南以经验资料为基础,分析了美国社会里社会资本普遍下降的趋势,并阐释了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和后果。在他看来,美国公民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联系减少导致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其主要原因包括:时间与金钱的压力、流动性和升迁、技术与大众传播以及代际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Putnam, 2000)。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ukuyama)则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定义为一种社会资本,他指出,在一个成员之间互相信任程度较高的社会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正式制度的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弥补,这些都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我们不难看出,在这里,社会资本已不再被视为某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而被视作一个群体、一个社区,甚至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和资源(Fukuyama, 2001)。同普特南等学者主要关注市民社会中的大规模社团或组织与社会资本下降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不同的是,班克斯提出,其实在社区内部小型的互助小组或团体却在增加,而且由于可接近性和规模小等原因,市民的参与率和活动频率相对比较高,这对改善公民的社会资本不无益处(Banks, 1997)。

而与以上学者在微观或宏观层面讨论社会资本不同,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他探讨的扩展的效用函数中,提出了“个人资本”(personal capital)的概念,意指“包括有关影响当前和将来效用的过去消费和其他个人经历”。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他全部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Becker, 1996)。也就是说,贝克尔在自己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加入了个人纵向的个人经历的考虑,把它与个人横向的社会网络相结合去分析,拓展了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从而深化了相关研究。研究者认为,贝克尔的观点与当今社会学研究中强调个人生命历程的视角是极其相似的,它对理解残疾人自助组织内部成员社会关系的发展与社会资本的建构有积极的启发意义。还有学者指出,在强调人际网络作用的社会背景下,个人资本建构与积聚的重要前提在于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认同的建立,而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可以建立信任并减少合作过程中的障碍与风险(Van Deth, 2003)。基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个人的社会资本的考察,应将其纳入到特定的网络关系中来加以理解,因为在社会中根本不存在隔离的个人。而对组织的社会资本而言,学者也提醒人们应注意它所具有的几个核心特征,即累加的、集体性的和双向功能(Van Derh, 2003)。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争论在于其本质是关系还是能力,其外延是个人、还是可以扩展到整个宏观社会结



构中去。可是,对于连接微观与宏观的中观层次,特别是针对组织的社会资本及其组织成员的社会资本的建构状况的研究还很有限,同时把组织成员的网络关系和组织资源动员的能力联系起来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组织的社会资本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资本两部分,同时二者的内涵分别基本界定为:自助组织的社会资本是指组织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透过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组织成员的社会资本是指自助组织成员通过组织获得的人际支持网络、资源和问题解决能力与技巧,具体表现为他们在生活或工作中的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支持与收获。最近几年学者发表的针对中国转型社会中自助组织的经验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非正规的自助小组(如抗癌小组)实践进行的经验探索,并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对自助组织的未来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陈津利,2000;张时飞,2001;Mok,2001)。也有一些学者针对其他华人社区的自助组织进行了一般性的探索研究,并指出这些组织存在的环境和所具有的特征(Mok et al.,2003)。然而,就理论拓展来说,上述的经验研究并未做出特别的解释或提出明确的方向。本文期望借用社会资本理论和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针对残疾人自助组织的特点,通过访问资料,发展出对中国城市基层自助组织的理论解释框架。

三 资料分析:残疾人自助组织中的 网络关系与社会资本建构

本研究是一项以定性方法为基础的经验研究,研究者在2004年2月至5月间利用深入访谈法对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以下有时简称“俱乐部”)这一自助组织及其相关成员进行了访问,访问资料经过聆听、转录、研读、编码和不断的分析,得到了有关残疾人自助组织的社会资本建构的分析结果。研究者在本文中从组织及其成员社会资本的两重性的视角出发,从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上来分析俱乐部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变化情形,试图在理论上说明我国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自助组织的发展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一) 俱乐部和俱乐部成员社会资本的两重性变化

当一个人参加一个群体获得社会资本的时候,会把他从所隶属的其他群体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带到这个刚参加的社会群体中来,这样就产生了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资本的两重性。这个过程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俱乐部的成员在俱乐部这个空间内获得了拥有多方面的社会资本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把自身的来自俱乐部以外群体的社会资本带入俱



乐部，这些都是通过成员自身的社会资本来为俱乐部整体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便利实现的。

1. 俱乐部社会资本的建构

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者发现俱乐部在至今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高潮和低潮的发展历程，俱乐部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以及与媒体的互动状况，正好用来说明这一自助组织社会资本的建构情形。但是，研究者也清楚，组织的社会资本的建构又是与俱乐部重要成员的个人社会资本密不可分的。

根据研究者得到的调查资料显示，俱乐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建立初期的辉煌时期、发展的低潮期、维持期和复苏发展期。经过对俱乐部四个发展时期的考察，研究者看出俱乐部作为一个残疾人自发成立的自助组织，其社会资本的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俱乐部发展的变化出现了波动，总的来说其社会联系能力、开展残疾人互助活动的的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减弱，从而导致它在残疾人中的凝聚力、信任程度和号召力降低。

从一定意义上讲，作为残疾人的组织，俱乐部为日后一些正式的残疾人社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残疾人社会团体的建立与发展也为残疾人争取了诸多的社会资源，有力地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官办社会团体的双重属性这一特质，它们在为残疾人服务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而作为草根组织的残疾人自助组织的俱乐部在这些方面就具有其优势，但是以往残联部门对俱乐部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的，这些尤其表现在俱乐部和所在地方残联的互动之中。俱乐部作为一个较早的残疾人自助组织，在全国存在着较强的示范效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俱乐部在成立初期与外地的一些地方残联建立了联系，但这些联系也只是阶段性的，并未形成持续性的、深入的互动。

W1先生在访谈中就谈到形成良性互动的愿望：“我觉得以后要发展我们这个残疾人的互助组织，搞良性互动还是必要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所调整。”

任何一个自助组织都不是孤立而封闭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与周围各类组织发生互动，因此，对俱乐部来说，社会网络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周围组织的互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自助组织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及资源动员能力，这些都对自助组织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周围的各类组织共同构成了自助组织的发展空间。近年来，随着国际非营利组织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开展各种活动，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俱乐部也



吸收了许多新的理念、方法，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潜在的资源。但受俱乐部现有能力的限制，互动的内容还主要停留在以开阔视野、学习经验的各种培训上，缺乏实质性的项目合作。除了国际非营利组织以外，俱乐部与其他国内的社团也有过接触，在全国民间非营利机构没有很好的发展以前，俱乐部与周围社团的互动主要停留在临时的互相借用性质的短期合作的水平上。在访谈中，该俱乐部负责人 W1 先生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感觉这些组织之间的分享啊、合作啊，程度很低。所以人家说中国民间组织还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没有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些还比较偏激，我的一些经验和想法不愿意和你分享，不愿意让你知道，我联系的基金会你最好不要了解，不是那么开放，包括心态，还有运作方式都还是自顾自的状态。其实这种借鉴和分享是非常必要的，如何可以实现的话，局面就会更好一些。”

在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下，俱乐部与外部组织的资源共享、合作共进的局面没有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的信任机制还没有被建立起来。

俱乐部社会资本的凝聚与俱乐部每个成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组织领导者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自助组织的发展状况与其领袖等主要成员的个人魅力、个人社会资本状况密切相关。领袖人物的丰富而有力的个人社会资本、个人魅力会对整个组织的社会资本建构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俱乐部的创始人“S 大姐”就对俱乐部内部在创立初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此外，“S 大姐”与各级残联为代表的政府部门的密切关系，为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她成为俱乐部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目前，“S 大姐”已经 60 多岁了，俱乐部的事情很多已经交给别的成员来负责。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与媒体的关系与互动也是影响俱乐部社会资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媒体是一个主体拓展其社会资本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之一。俱乐部初期规模的迅速增加与媒体的报道是直接相关的，很多残疾人都是通过媒体了解的俱乐部。但是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俱乐部和媒体的关系也经历了从高潮到低潮的过程。

2. 俱乐部成员社会资本的建构

俱乐部的主体成员一直是以肢体残疾人为主的，其中又以小儿麻痹患者居多，这与俱乐部成立时的背景密切相关。俱乐部成立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距离 50~60 年代我国小儿麻痹症的流行将近二十年，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一批由于小儿麻痹后遗症而造成的肢体残疾者大多进入了三十岁的年



龄段，他们普遍面临着走出校园、进入社会这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重大变迁。俱乐部会员的主体在参加俱乐部之前普遍没有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在加入俱乐部、成为会员以后，由于个人的参与程度和能力的差异，他们的社会资本状况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相比一般的俱乐部参与者而言，核心组具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提高机会和交往面，这样长期以来就获得了多于一般成员的能力和经历以及成员的信任，也就更有条件改善自身的社会资本状况。在俱乐部当中，成员重新认识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和见识，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在俱乐部中，当某一个成员遇到问题或者困惑的时候，通过和俱乐部成员的沟通，可以将问题轻松化，有助于减少该成员过分的心理压力。群体资源的灵活动员和有效搭配也有助于俱乐部成员解决眼前的困难。从总体来说，俱乐部是成员个人社会资本的一种可能的来源。除了在精神上为这些肢残人提供了寄托和支持以外，俱乐部还促使了一些内部的“亚团体”的形式。俱乐部提供的交流机会使得大家互相认识和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小规模的、彼此更加熟悉和密切的朋友圈子，这些对俱乐部成员的实际生活起着具体的支持作用，是他们的重要生活圈子。“残疾人摩托车救助俱乐部”、“二六二病友会”等都是这样的例子，除了这些小团体外，还有各个大小不同的关系密切的“小圈子”。

具体来说，根据俱乐部成员的访谈资料，大致可以把他们在俱乐部的收获归纳为社会交往、经济、健康、生活技巧四个方面。通过俱乐部的活动，这些肢体残疾人增加了参加社会活动和与社会各个阶层、团体接触的机会，这些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增加了他们的见识并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在加入自助组织并参与其活动后，成员在心理认知上发生了变化，多数人与过去相比，对自我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满足感变得正面与积极了。这也是受访的俱乐部成员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俱乐部在经济方面给成员提供的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间接的，具体来说包括培训机会、学习机会、工作信息等资讯和机会的提供。这些机会和信息为残疾人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找到适合的工作，解决基本生活等或多或少发挥了帮助作用。俱乐部成员在健康方面的收获可以分为身心两个方面。在身体机能方面，俱乐部开展的游泳、柔力球等体育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受活动开展的时间和规模的限制，真正受益的人还没有扩大到整个俱乐部。在心情方面，俱乐部的成员就普遍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对于大家的心理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至于生活技巧方面的收获，更多的是表现在处世和交往的技巧方面，而残疾人群体自身居家生活的相关技巧，在俱乐部的活动中体现得并不明显，这是自助组织的一个优势，有待于俱乐部去进一步挖掘。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整体上,俱乐部成员在俱乐部中都或多或少地建构起一定的社会资本,这也是俱乐部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俱乐部中每个成员的获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存在差异的。究其原因,俱乐部成员从俱乐部中获得的收益的多少受他的观念、能力、参与程度和精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3. 俱乐部与成员社会资本的两重性

在分别讨论了俱乐部和俱乐部成员的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以后,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二者之间的两重性关系。个人与群体的两重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个人在进入网络时,不仅仅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点,而是将其他网络关系带入现在的网络。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同时参与很多社会群体的时候,他会带有很多群体的印记。这个思路在分析俱乐部社会资本状况时也是同样适用的:当一个人参加一个群体,获得社会资本的时候会把他从所隶属的其他群体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带到这个刚参加的社会群体中来,这样就产生了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资本的两重性。对于残疾人来说,参与次级社会群体的机会比较有限,因此在俱乐部及其成员社会资本的两重性的分析中,除俱乐部之外的其他群体更多的是成员所属的其他初级社会群体,比如:家庭、朋友群体等。对于在参加俱乐部后有了就业机会的成员,单位这个次级社会群体对于俱乐部及其成员的社会资本的两重性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俱乐部及其成员社会资本的两重性可以造成成员个人的社会资本和俱乐部作为一个组织的社会资本的循环累积。但这些循环累积是需要内外条件才可以形成的。当俱乐部成员从中获益^①增加的时候,对俱乐部贡献的意愿和能力也会增加,这样双方社会资本的循环累积就可以实现;而俱乐部能够提供给成员收益减少时,成员对俱乐部社会资本建构和发展的意愿和能力也会随之减少,这样就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本的循环累积,而是出现双方社会资本的削弱。因此在俱乐部发展的不同时期,俱乐部社会资本和成员社会资本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除了俱乐部成员个人社会资本的获取与俱乐部的发展相伴随之外,俱乐部及其成员个人社会资本的两重性关系还表现在俱乐部成员之间的互助上。

“我们俱乐部帮困互助,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比如说婚姻问题啊,大家都帮他出谋划策,甚至有的人办个婚礼

^① 这里的收益不仅指那些看得到的实惠,即物质层面的收益,同时也包括自身价值的实现、成就感等价值层面的内容。只有全面的考虑这两个方面的收益才能对双方社会资本相互关系的状况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都非常紧张，大家都帮他组织，给他掏钱。还有谁的孩子生病了，大家也都掏钱出来，解决燃眉之急，确实是燃眉之急。”（W1 先生）

俱乐部为成员之间社会资本的相互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些互助为俱乐部成员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二）俱乐部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原因分析

在综合考察了俱乐部及其成员社会资本的两重性以后，笔者认为，俱乐部在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资本变化表现出下降的态势。

1. 俱乐部社会资本下降的主要表现

参照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全面分析并论述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象，笔者认为也可以得出俱乐部作为一个组织在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社会资本下降的结论。普特南是从美国公民社区参与和社会联系（包括正式的社会交往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减少，社会信任指数下降这些角度去分析和总结，从而得出社会资本下降这一判断和结论的。这些指标和依据对分析俱乐部二十年来社会资本的发展变化状况同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普特南分析着眼于美国社会这一宏观层面，而俱乐部是一个中观层面的组织，因此并不能完全套用普特南的分析依据。同时，研究者在分析中必须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

出于这样的考虑，研究者认为俱乐部社会资本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俱乐部活动的减少一方面降低了俱乐部及其成员与外界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也是造成俱乐部成员参与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俱乐部规模的停滞甚至萎缩也是俱乐部社会资本下降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俱乐部 2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成员规模并没有相应的增加，反而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减少，尤其是近些年来较少有新的、年轻的会员的加入。“这些人的年龄都在 40 来岁，40 岁往下的人太少了，基本都是 45 岁上下这个年龄。”（L 女士）“我们（指俱乐部）虽然叫病残青年俱乐部，但是三十岁以下的找不着了。”（W1 先生）第三，从整体上来讲，俱乐部成员对俱乐部活动的参与程度降低了，这也是俱乐部社会资本下降的重要表现方面。对俱乐部的参与程度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与俱乐部其他成员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的减少，这也就意味着俱乐部成员在俱乐部内部的非正式的社会联系的减少。X 女士曾提到“那段的活动我基本都参加。但是后来工作以后，一直处在繁忙当中，慢慢地就淡出了。前几年俱乐部搞了一个多少周年的活动，我去了。这些老朋友我都见到了，老朋友还行，新朋友都不认识了。”从俱乐部与成员社会资本的两重性的角度来考虑，俱乐部成员对俱乐部社会参与的减少，一方面使成员之间互助性的互动减



少，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他为俱乐部带入的来自其他群体的社会资本的减少，这显然对俱乐部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不利的。

2. 俱乐部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分析

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分析了美国社会资本普遍下降的状况之后，还给出了几点可能的原因：第一，时间与金钱的压力；第二，流动性和升迁；第三，技术与大众传播；第四，代际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关系网络的封闭性、稳定性、意识形态和官方支持下对富裕需要的满足。这些对笔者分析俱乐部社会资本下降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笔者将结合普特南、科尔曼的分析以及俱乐部自身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从俱乐部成员、俱乐部组织本身和俱乐部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三个方面去寻找原因。

首先，从俱乐部成员个体来看，在俱乐部成立时，大部分参加的会员是处在待业、单身状态的，后来随着成员逐步参加工作、成家，进入不同的人生历程当中，生活的压力逐渐增加，大家的时间和精力都围绕着家庭和工作，投入到俱乐部的时间和精力都不能得到保证。而俱乐部的成员主体一直未发生变化，年轻成员的补充很有限。X女士就表示：“（很多活动都）参加过，就是没有坚持下来，一上班以后时间就少点，那几年又是连上班带学习，所以（参加活动）就特别少了。”Z2女士也提到：“生活压力也是比较大，不像80年代都是单身，在外玩一天，回家吃父母的，这时候就不是那样了，有孩子，有家的，你得想办法去挣钱，所以也是一个障碍。”“那时候我们真是纯义务的，现在让谁都纯义务吧，不太现实了，因为孩子得吃饭啊，（纯义务）不太现实了。这也是我们现在搞活动比较大的障碍。”

研究者发现，俱乐部成员进入工作和家庭领域以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彼此间的交流减少，信任网络的建立变得比以往困难了。俱乐部不再是获得社会支持的惟一途径，这样俱乐部在维持和发展社会资本方面的重要性就相对下降了。影响俱乐部成员参与程度的因素还有成员的变迁和流动性。在80年代初期，俱乐部的成员大部分都居住在老城区，大家的交往也比较便利，而随着北京市的发展和城市建设，很多人搬迁到了离俱乐部较远的新区，甚至郊区，大家的居住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了，而是越来越分散，这也为组织大型活动带来障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残疾人当然也不例外。人们在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时，抱的想法也和二十年前不同了。俱乐部成员对俱乐部发展的共识和发展方向都开始出现分化。

其次，从俱乐部的层面上来考察，组织的正式登记与注册所涉及的技术和程序问题一直是困扰组织发展的瓶颈。由于俱乐部无法实现社团注



册，所以一直没有取得合法的身份，这样组织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一直在维持当中。2003年实现的工商注册为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和平台，也使俱乐部有条件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合法性的问题还直接导致了俱乐部的组织能力建设、人才培养、资金等方面的不足，它无法根据情况的不同及时调整组织的结构和发展。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残疾人组织还不可避免地体现着本群体自身的特点，残疾人组织俱乐部的活动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组织俱乐部工作的W1先生就很有苦衷：“真由残疾人掌管的组织，都存在能力问题、观念问题，其实观念问题和能力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残疾人又很排斥不以残疾人为主体的工作，我们也不接受，所以有时候也挺困难的，就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沟通。”

最后，可以从俱乐部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来分析：第一，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满足。残联的成立和发展使得残疾人的各方面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对残疾人需求的满足程度也越来越高。这样对俱乐部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所必需的社会联系就弱化了。在访问中，受访者L女士就曾提到：“现在各个地区、各个街道的残联也都成立了，它有它的活动范围，他们都有国家拨经费的，有现成的活动场地，有一部分的资金或者礼品什么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活动特别不利的地方。”第二，技术与大众传播的发展。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在带给世界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的弱化，这是一个正在被全球所关注的问题。这一趋势也同样影响着俱乐部的社会资本维持。第三，国内非营利机构发展的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合作和共享的意识，这也使俱乐部无法充分利用这一社会支持来发展自身的社会资本。

（三）俱乐部社会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分析

在俱乐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整体的社会资本没有能够实现累积，而是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而俱乐部及其成员要实现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和累积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

第一，俱乐部从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信任基础还存在，这一信任基础在目前俱乐部成员有条件更多地投入俱乐部的情况下起到了前提作用。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在其成立初期加入俱乐部的，二十多年来对俱乐部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俱乐部成员之间也形成了深厚的友情，甚至亲情。同时经历了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之后，俱乐部的成员正在或将要经历人生的另一次大的变迁：离职（退休或者下岗等）。在这个阶段，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减少，有更充足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俱乐部，也有愿望来通过俱乐部维持其原有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现在退休的退休，还有可能焕



发青春。因为那时大家都二十多岁，是一个阶段。现在我们觉得又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大家都更有时间了，而且孩子也大了，自己也甭管收入不收入了，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了，要不就是吃国家低保了，身体也有出来锻炼的需求了，或者我得出来娱乐了，觉得大家正好都有这种要求，有这个精力，有这个时间了，也有这个愿望。”（Z2女士）

第二，2003年俱乐部实现了工商注册，成立了“汇天羽信息服务中心”，这无疑俱乐部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重要变迁，势必对俱乐部的发展轨迹产生影响，这为俱乐部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和累积提供了保证。“‘汇天羽’注册成功了，我们就有了合法的身份，那么你做起事情来就可以得到一些部门和社会的支持，做起事情来就不像过去那么缩手缩脚，或者说有一些限制吧，你可以去争取做了。”（W1先生）注册成功后，俱乐部开始着手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确定固定的活动场所，设计组织标志，添置基本设施等，这些组织形式建设方面的努力对于组织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信任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目前俱乐部实现社会资本累积具备较好的外在环境。一方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认识和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进，歧视少了，理解和支持更多了。另一方面，中国整个市民社会的发展态势为俱乐部社会资本的累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政府各级部门对包括自助组织在内的非营利机构有了更加全面和适当的认识，对自助组织的发展也更加接纳，俱乐部对残联的认识也提高到互补和合作的层面上来了。而国际非营利机构又为俱乐部提供了大量的国际经验，大大拓展了俱乐部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资源来源。

（四）自助组织对改善残疾人福利的功能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残疾人福利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我国目前的混合福利制度下，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政府的正式支持系统还不能覆盖残疾人保障需要的所有领域。这样，社会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网络就不得不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又是与每个残疾人自身的社会资本状况密不可分的。在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未能覆盖的地方，民间社会的互助合作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而其基础就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王思斌，2002）。俱乐部作为残疾人自发形成的自助组织就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功能。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残疾人具有的社会资本水平对他能得到的保障程度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具体来说，俱乐部作为残疾人自发组织的，以自立互助为宗旨的自助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残疾人福利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俱乐部作为残疾人的自助组织，是对残疾人初级社会群体的建构和完善的一种努力，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残疾人发展自身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其次，对残疾人相关福利政策的制定，福利保障体系的完善起着间接的呼吁、引导作用。俱乐部是残疾人自己建立的组织，最了解残疾人群体的需要，最能反映残疾人共同的要求。再次，残疾人在俱乐部中的交流、沟通以及共同生活，有助于他们提升自身的意识，以正常化的眼光看待自身的生理缺陷，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培养残疾人的自尊和自信，提升残疾人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最后，自助组织除了对社会问题有一定的消极补救功能，更重要的是自助组织作为潜在共同体在建构个人社会身份，创造良好社会关系和增强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改善功能。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是以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为研究对象展开的一项个案研究，研究者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论述了俱乐部成立 20 多年来，这一组织及其成员的社会资本变化情况；从理论上分析和解释了俱乐部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及未来的发展空间；探讨了俱乐部这种自助组织形式对整个残疾人的社会福利的贡献，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俱乐部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是一批有着相似经历的肢体残疾人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一种自发的应对和反馈方式。在俱乐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变化清晰地反映了俱乐部成员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些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如疾病引发的残疾）对他们的人生际遇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俱乐部作为一个自助组织，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结构性的嵌入，正是这种嵌入使残疾人得以在社会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与整个社会建立联系，建构和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同时，俱乐部及其成员的社会资本又呈现出两重性的关系，个人在通过加入组织而建构和发展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必然会带入来自其他群体的个人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

第三，俱乐部成员对俱乐部的投入是他们建构和扩展其初级社会群体的过程，这个群体的存在自身并没有蕴含充足的社会资源，但是却提供了很好的体验、沟通、理解、支持和信任的平台，如果单纯从西方学者分析社会资本时常用的工具性的计算未来可能的收益来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四，俱乐部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这种下降并不意味着俱乐部成员个人社会资本的下降。笔者在本论文中



的讨论不同于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整个民族、社会的公民精神和自愿主义，笔者讨论的组织的社会资本是指组织通过动员组织内外部资源而使组织自身或者其成员获益的能力，分析俱乐部这一自助组织的社会资本是在中观层面上展开的。同时，人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联系由自愿组织转向政治或商业组织离不开国家政治—经济这一宏观的制度环境。因此，自助组织在我国转型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必然受到相应的制度约束，包括法律、政策规定及相关制度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自助组织在国家与市场空间所做的选择。由于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和国家政治约束的双重作用，研究者通过社会资本的下降来分析自助组织的社会资本变化状况是比较恰当的。在论文中研究者通过俱乐部组织发展历程、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与互动、与政府部门（主要表现为各级残联）的关系与互动、俱乐部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个人社会资本状况等方面的分析，指出了俱乐部社会资本下降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其中各种可能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第五，采用封闭性网络还是开放性网络的形式来塑造组织的结构，不但与组织提供的社会资本的侧重有关，更是组织的发展阶段本身所必然要求的。在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中，封闭性的网络很长时间都被当作组织产生和维持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在布迪厄看来，群体的封闭性和群体内部的密度是必需的。科尔曼也把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列入了他分析的影响社会资本创造、保持和消亡的社会因素的第一条。科尔曼认为封闭意味着在一定数量的人之间存在着足够的纽带，保证他们遵守规则。直到博特（Burt）提出的结构洞研究中，才首次不把开放性网络和封闭性网络视为对立或竞争的社会资本范式，相反认为他们是相互补充的。在他看来，开放性的网络以结构洞的分析为典范，如果联系超越了群体，就会增加群体及其成员的价值；而群体内部的资源充分且被用于群体或个体成员的获利时，封闭网络也是有效的（张文宏，2003）。研究者认为对一个组织来说，在它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其内部的资源的状况及其组织或成员的使用情况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必然要求组织调整其组织形式来加以适应，从而保证组织的社会资本的维持和发展。对于俱乐部而言，开放性网络一方面有利于扩大组织的规模，增加人力资本，稳固和提升俱乐部在成员中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俱乐部在残疾人群体和整个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增强其获得各种社会资源，建构俱乐部自身社会资本的能力。关于提升自助组织的能力建构的策略方面，国外已有研究表明，专业工作者的介入和协助，有利于促进自助小组或组织成员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对解决自助组织或小组的问题、提升成员的技巧和能力都有较显著的作用（Ben-Ari, 2002; Carlsen, 2003）。因此，要提升我国残疾人自助组织在解决生



活适应和就业发展方面的能力，除了强化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与互助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人员的协助（如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心理咨询人员等），促成残疾人的社会融入，从而真正改善他们的社会资本的状况。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研究者在对俱乐部社会资本分析的时候，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些角度加以论证，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发现和想法，还有很多视角没有去尝试。比如说俱乐部社会网络的网络位置、关系强度等定量化的分析手段都没有涉及，而这些也是完整的形成对俱乐部社会资本状况的认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学术关注。在研究中作者更多的是在强调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没有去讨论它可能产生的消极功能甚至反功能，而这一点一直使社会资本理论受到最明显的批判，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重视到这一问题并发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在本论文中，研究者考虑到自助组织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在目前阶段更多地需要去关注它的积极作用，促进其发展，更好的体现其不可替代的积极功能，因此没有在其今后可能会导致的“志愿失灵”等消极功能上着墨。随着自助组织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将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1998): “找回强关系: 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 《国外社会学》, 第 4 期。
- 陈津利 (2000): 《中国乳腺癌患者在自助团体中的情感支持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
- 董杨 (2003): 《北京市民间合唱团研究——从个人化资本到社会资本》,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 未发表。
- 傅谨 (2001):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福山 (Fukuyama, Francis) (1998):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李苑蓉译, 北京: 远方出版社。
- 何增科等 (2000): 《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莱斯特·M. 萨拉蒙等 (2002):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林平 (2002): 《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1999):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振杰 (2004): 《草根调查: 中国基层发展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北京: 经济管理



出版社。

马洪路 (2002):《中国残疾人社会福利》,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马克·S. 格拉诺维特 (1998):“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第4期。

孙丽军 (2003):“社会资本:文献与进一步的研究”,《社会科学》,第1期。

王长征 (2002):“残疾人弱势群体的现状与社会福利需求探讨”,阎青春主编《社会福利与弱势群体》,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王思斌 (2002):“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熊跃根 (2001):“转型经济国家中‘第三部门’的发展:对中国现实的解释”,《社会学研究》,第1期。

熊跃根 (2003):“市民社会向何处去?”,《中国发展简报》,冬季刊。

杨团 (2000):“中国的社区化社会保障与非营利组织”,《管理世界》,第1期。

詹姆斯·科尔曼 (1999):《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时飞 (2001):《上海癌症自助组织研究:成员参与、社会支持和社会学习对增权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未发表。

张文宏 (2003):“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张洪英 (2003):“妇女组织的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及其资源动员——以‘热心大嫂’服务中心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Banks, E. (1997). The social capital of self-help mutual aid groups. *Social Policy*, 28 (1).

Baron, S., Field, J. & Schuller, T. (2000).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G. (1996). *Accounting for tas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Ari, A. T. & Azaiza, F. (1996). Associated meanings of the concept “self-help” among Israeli professional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Vol.19.

Ben-Ari, A. T. (2002). Dimensions and predictions of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in self-help groups: A view from within. *Health & Social Work*, Vol.27, No.2, pp.95~103.

Borkman, T. & Schubert, M., (1995).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s a strategy for studying self-help groups internationally. In F. Lavoie, T. Borkman & B. Gidron (ed.), *Self-help and mutual aid groups: International and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45~68). New York: The Hawo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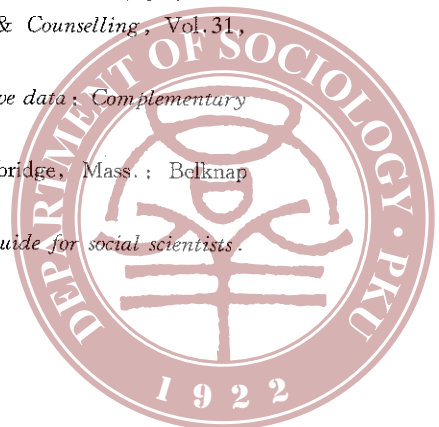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lsen, B. (2003). Professional support of self-help groups: a support group project for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pat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Vol.31, No.3, pp.289~303.

Coffey, A. & Atkinson, P. (1996).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Complementary research strategi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Coleman, J.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ey, I. (1993).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user-friendly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Dinitto, D.M.(eds.) (2001).Self-help group meeting attendance among clients with dual diagnoses.*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56.

Durlauf, S.N. (2002).Bowling alone: 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7, pp.259~273.

Erik, B. (1997).The social capital of self-help mutual aid groups.*Social Policy*, Vol.3.

Felix-Ortiz, M. (eds.) (2000).Addictions services: A qualitative evaluation of an assisted self-help group for drug-addicted clients in a structured outpatient treatment setting.*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Vol.36.

Finn, J. (1999).An exploration of helping processes in an online self-help group focusing on issues of disability.*Health & Social Work*, Vol.24.

Franklin, J. (2003).Social capital: Policy and politics.*Social Policy & Society*, 2 (4), pp.349~352.

Fukuyama, F. (2001).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Third World Quarterly*, 22 (1), pp.7~20.

Goldberg, C. (2001).Social citizenship and a reconstructed Tocquevill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2), pp.289~315.

Goodman, G. & Jacobs, M. K. (1994). The self-help, mutual-support. In A. Fuhriman & G. Bulingame, *Handbook of comprehensive psychotherapy*, (pp. 489~526). New York: John Wiley.

Gottlieb, B. H. (1982). Mutual-help groups: Members views of their benefits and roles for professionals. *Prevention in Human Services*, 1 (3), pp. 55~68.

Gray, R.E. (2001).Cancer self-help groups are here to stay: Issues and challenge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Journal of Palliative Care*, Vol. 17.

Hatzidimitriadou, E.(2002).Political ideology, helping mechanisms and empowerment of mental health self-help-mutual aid groups.*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2, pp.271~285.

Hellerich, G.(2001).Self-help visions and practices in Germany.*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Vol.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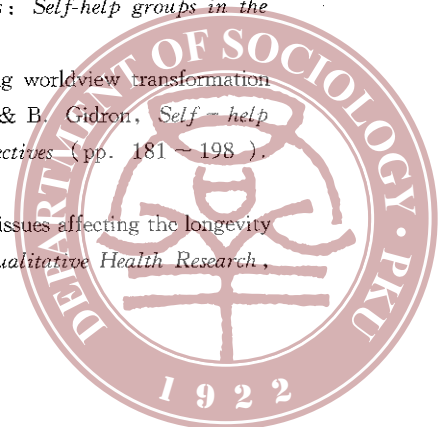
Humphreys, K.& Ribisl, M.K. (1999).The case for a partnership with self-help groups.*Public Health Reports*, Vol.114.

Hyden, G. (1997).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Dissection of a complex.*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2 (1), pp.3~30.

Katz, A.H.& Bender, E.I. (1976).*The strength in us: Self-help group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Kennedy, M. & Humphreys, K. (1995). Understanding worldview transformation in members of mutual help groups. In F. Lavoie, T. Borkman & B. Gidron, *Self-help and mutual aid groups: International and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81~198). New York: Haworth.

King, G. (eds.) (2000).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sues affecting the longevity of self-help groups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Vol.10.

Kurtz, L. F. (1990). The self-help movement: Review of the past decade of research.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13 (3), pp.101~115.

Kurtz, L. F. (1992). Group environments in self-help groups for families. *Small Groups Research*, 23, pp.199~215.

Kurtz, L. F. et al. (1995). Involvement in alcoholics anonymous by persons with dual disorders. *Alcoholism Treatment Quarterly*, 12 (4), pp.1~18.

Kurtz, L.F. (1997). *Self-help and support groups: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Thousand Oaks: Sage.

Liberman, M. A. & Borman, L. D. (1979). *Self-help groups for coping with crisis: Origins, members, processes, and impac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Lieberman, M. A. & Snowden, L. R. (1993). Problems in assessing prevalence and membership characteristics of self-help group participant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9, 166~180.

Lin, N. (1999).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Vol.22 (1).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Lond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ke, D. A., Roberts, L. & Rapport, J. (1993). Individual, group context, and individual-group fit predictors of self-help group attendance.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9, pp.216~238.

Mackian, S. (2002). Complex cultures: rereading the story about health and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2 (2), pp.203~225.

Madheswaran, S. & Dharmadhikary, A. (2001). Empowering rural women through self-help groups: Lessons from Maharashtra rural credit project.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56.

Marquand, D. (2004). The public domain is a gift of history, now it is at risk. *Newstatesman*, Vol.1, No.19.

Martyn, H. (2000). *Taking sides in social research: Essays on partisanship and bia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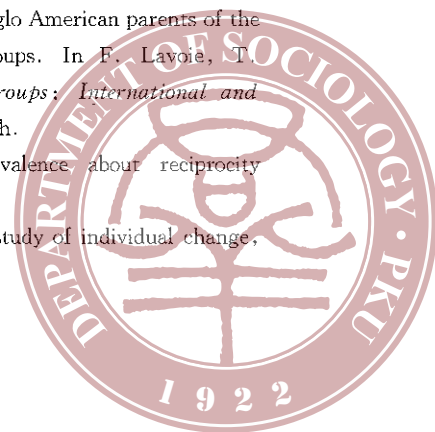
Maton, K. I. (1993). Moving beyond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is in mutual help group research. An ecological paradigm.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9 (2), pp.272~286.

Medvene, L. J. & Krauss, D. (1989). Causal attributions about psychiatric disability in a self-help group for families of the mentally ill.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 pp.1413~1430.

Medvene, L. J. et al. (1995). Mexican American and Anglo American parents of the mentally ill: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support groups. In F. Lavoie, T. Borkman, & B. Gidron (ed.), *Self-help and mutual aid groups: International and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pp.141~164). New York: Haworth.

Medvene, L.J. & Teal, C.R. (1997). Leaders' ambivalence about reciprocity obligations in self-help groups. *Small Group Research*, Vol. 28.

Mok, B.H., (2001). Cancer self-help groups in China: A study of individual change,



perceived benefit, and community impact. *Small Group Research*, Vol.32.

Mok, B.H., Chau, K.L., Fung, H.L. & Ngai, N.P. (2003). Prevalence, role and functions of self-help group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37, Issue 1, pp.87~96.

Moos, R. H., Finney, W. R. & Maude-Griffon, P. (1993). The social climate of self-help and mutual support groups: Assessing group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outcome. In B. S. McCrady & W. R. Miller, *Research on Alcoholics Anonymous: Opportunities and alternatives* (pp.251~270).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Center for Alcoholic Studies.

Morrow, V. (1999). Conceptualising social capital in relation to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critical review,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7, Issue 4.

Norton, S., Wandersman, A., & Goldman, C. R. (1993). Perceived costs and benefits of membership in a selfhelp group: Comparisons of members and nonmembers of the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ll.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29 (2), pp. 143~160.

Paxton, R.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pp.254~277.

Pancoast, D.L., Parker, P. & Froland, C. (1983). *Rediscovering self-help: Its role in social care*,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pp.1~24.

Potok, A. (2002). *A matter of dignity: Changing the lives of the disabled*, New York: Bantam Books.

Putnam, R.D., Leonardi, R. & Nanetti, R. Y.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1993.

Putnam, R.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6, No. 1.

Putnam, R.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Quigley, K.F.F. (1996). Human bonds and social capital. *Orbis*, 40 (2), pp.333~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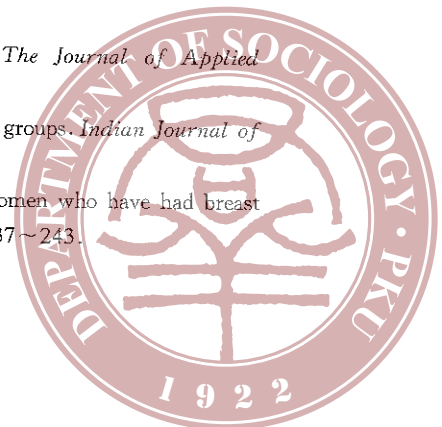
Rappaport, J. (1993). Narrative studies, personal stories,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mutual help context.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9, pp.239~256.

Rapporteur, S.L. & Shetty (2001). Rapporteur's report on working and impact of rural self-help groups and other forms of microfinancing.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56.

Ronel, N. (2000). From self-help to professional care.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36.

Satish, P. (2001). Some issues in the formation of self-help groups. *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56.

Silverman, P. R. (1989~1990). Self-help groups for women who have had breast cancer.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 (3), pp.237~243.



Skidmore, D. (2001).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 Society*, 15 (1).

Stokes, B. (1981). *Helping ourselves: local solutions to global problems*, New York: Norton.

Van Deth, J.W. (2003).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orthodoxies and continuing controvers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6 (1), pp.79~92.

Videka-Sherman, L. (1982).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in a self-help group for bereaved parents: Compassionate friends. *Prevention in Human Services*, 1 (3), pp.69~78.

Wann, M. (1998).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In J. Franklin (ed.), *Social policy and justice*, London: Polity Press.

Wituk, S. (eds.) (2000). A topography of self-help groups: An empirical analysis. *Social Work*, Vol. 45.



**Social Capit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lf-help Organizations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Xiong Yuegen He Xi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o build and develop the self-help organizations emphasizing mutual-aid and self-reliance has been advocated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reconstructing new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 welfare reform. Employing a case study approach,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attempt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how “the Beijing Club for the Handicapped Youth”, a self-help organization forms its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wo main strategies,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ir own network (Guanxi) and marketing strategy in augment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organization, played a substantial role in its expanding social capital during the two decade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causes of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of this self-help organization and its function in promoting inclusion as well as participation of the handicapped people in local communitie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Key words: self-help organization, the handicapped people, social capital.

